

机器人演艺中机器智能美学的建构逻辑与设计维度研究

■上海戏剧学院 闫威旭

近年来,智能机器从预编程动作的执行装置,嬗变为参与叙事建构、情感传递乃至意义生产的表演主体。既有研究惯于将其锚定于“科技赋能艺术”的技术主义框架,以动作精度、交互流畅度及视觉奇观为操作性判准,却未聚焦更具本体论颠覆性的理论事实:机器人登台并非剧场工具谱系的线性升级,而是智能体介入所激发的审美范式迁移。机器智能美学应是以具身智能体为感性界面,以算法逻辑为形式语法、以人机协同为生成场域的新型审美系统。这一美学形态不是传统戏剧范畴在数字语境中的延展,而是对“表演何为”“共情何谓”“真实何指”等戏剧元命题的系统性质询与根本性重估。

智能机器由工业工具到演艺主体的身份跃迁,开启了一场关于“何以为美”的本体论追问。机器人演艺所敞开的智能美学,是从“再现美学”向“关系美学”的结构性范式转换。在设计实践的双重维度——外观层面对工业符号的转译与功能赋形,内容层面对人机交互机制与观演关系的重构。这一美学转向共同指向一种新的审美政治:美的生成不再仅以人类感知为尺度,也能在异质主体间的相遇界面中得以发生。由此,机器智能美学的规范建构不应被理解为对技术边界的约束性限定,而应被锚定为对价值坐标的主动性勘定。只有当设计意识完成从“技术奇观的陈列”向“审美修辞的自觉”的跨越,机器人演艺才能真正脱离技术实验的附属性地位,完成向独立艺术门类的身份蜕变。

一、智能机器的主体性破界与建构路径

当代机器人演艺实践中,智能机器的主体

性建构呈现为相互交织的理论进路。第一,现象学视域下的“具身化他者”。《骆驼祥子》中采用四足机器人B1,让机械骆驼成为祥子的化身和象征。全运会上人形机器人Walker S2以算法复现先秦铜铎的千年颤音。机器人戏曲《霸王别“机”》中全国首位机器人博士学霸01扮演楚霸王,让盖世英雄化为悲壮的代码。智能机器让文明记忆从“被再现的对象”升格为“可编程的遗产”。第二,交互界面的技术中介。《巨物之城》中机器人“岚”的眼部安装摄像装置,在戏剧中融入实时影像技术。综上,机器人戏剧的主体性是一种“生成的主体性”。它栖居于人与非人、控制与自主、预设与即兴之间,其美学张力恰恰来源于这种本体论的不确定性。

二、机器智能美学的设计维度:从外观到关系

(一)外观界面:符号转译与功能重构

外观是机器智能美学的感性界面,其设计命题涵盖机器本体造型与演艺场景营造双重维度。在机器造型层面,核心议题在于拟人化策略与恐怖谷效应的张力调适。远征A2机器人的“百事可乐皮肤”,以流行文化符号消解工业机器的冷峻感,实现从“工厂他者”到“生活伙伴”的身份转译。《霸王别“机”》中机器人“学霸01”的霸王扮相,于京剧脸谱的符号复刻之外刻意保留机械手的裸露本体,采用“写意的拟人”策略,使观众在文化符号层面完成审美

接纳的同时,始终保有对硅基异质性的清醒认知。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,“穆桂英”造型戏曲机器人身披3D打印铠甲与小演员同台。符号与功能在机械本体上达成统一,传统戏曲的程式化动作被转译为可计算、可迁移的运动数据集,戏剧时空由此获得数字化的无限延展。在演艺场景设计层面,数智技术构成机器人表演的感知场域。场景不再作为被动背景,而应升格为叙事生成与感知分配的能动界面。多媒体影像、机械装置、交互设计等数智技术并非外在于机器人演艺的工具性补充,而是与其构成媒介共生的本体性要素,场景赋能的本质并非功能增效,而是通过技术中介重构舞台表意系统,使剧场空间从“被观看的环境”转化为“参与表演的行动者”。人工智能戏剧《AI之梦》于太空电梯场景中调动环绕影像与运动模拟系统,使观众在沉浸式遨游中完成对智能机器表演的信任交付。场景设计在此不仅是视觉修辞,更是以具身模拟为中介的感知重构。

(二)内容美学:从共工到共在

内容美学的根本追问是“机器人如何共在”,其展开呈现为演员交互关系与观演关系的双重重构。其一,演员之间的人机交互从“编程控制”迈向“具身对话”。智能机器不应被定位于执行指令的表演工具,而应成为激发演员想象、拓展角色疆域的创作媒介。智能机器的算法模拟可生成超越物理现实的虚拟情

境,为真人演员的情绪准备提供可进入的意义空间;智能机器对动作、表情、语音的实时分析,能够将真人演员的身体表现转化为可观测、可反馈、可迭代的操作性数据。智能机器在此成为演员身体的“技术义肢”,既延长语言与肢体的表现边界,又以异质感知系统反照亮人类表演的盲区。其二,观演关系的场域转换:从“心象投射”迈向“具身沉浸”。传统戏剧审美以观众对虚构世界的想象性认同为逻辑基点,而机器人演艺借助交互界面构建出可介入、可对话、可协商的混合性场域空间。在演艺设计维度,需引导观众审美判断的范式转型,使其从“像不像”“真不真”的认识论判断框架,转向伦理学层面的“如何相处”的实践考量。促使观众不再执着于探究机器是否具备情感,而是在与机器人共舞、对视、沉默等多元互动时序中,协同构建跨越物种界限的情感叙事文本。因此,机器智能美学的核心价值与根本贡献在于,将审美从传统意义上静观式的距离性对象,转化为具有参与性的生成性过程,进而实现从“再现美学”向“关系美学”的范式跃迁。

在科技与艺术相互交融的背景下,机器人演艺开辟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审美新境界。机器智能美学设计不仅系统性地重构了演艺产业的生产逻辑,更意味着在技术时代,人类对审美秩序的根本性重构与思想基础的重塑。

数字中国战略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实践图景与范式创新

■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杜洪雷

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,统筹推进教育强国、科技强国、人才强国建设成为重要议题。在推进数字中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,新时代高校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思政教育工作,及时有效占领网络空间这一重要阵地,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。

一、新时代高校推进网络思政教育工作的实践困境

(一)运行机制不够顺畅

新时代高校普遍重视网络思政工作,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,运行机制仍存在诸多不畅之处。例如,部分高校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网络思政教育长效机制,缺乏高效、全面、系统的育人方案,网络思政教育主体的内部关系尚未完全理顺,宣传部、学工处、团委、各二级学院及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各自为政,导致有限的教育资源分散、重复建设,资源共享程度低,难以形成高效的教育合力。例如,部分高校的育人队伍相对紧张,缺乏专业化、专一化的网络思政教育队伍。多数网络思政教育者均为兼职,既要承担繁重的管理、教学任务,又要参与网络思政教育工作,导致精力分散,难以保证工作质量。

(二)高质量育人作品相对匮乏

高质量网络思政教育作品的匮乏是新一

代高校网络思政教育面临的又一难题。一是供给数量不足、质量参差不齐。部分高校由于经费投入有限、技术支持不够,加之教育者数字理念相对滞后、数字知识和技能水平有限,导致作品多为传统“说教式”内容,缺乏亲和力、吸引力和影响力。二是形式僵化滞后,未能充分利用短视频等新媒体,难以走进青年大学生的内心。三是更新较为缓慢,多为任务式推送,未能及时融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时政热点,价值引领作用有待提升。

(三)传播力度相对有限

传播力度有限是制约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因素。首先,传播渠道相对单一,或以网络思政课程为主,或以网站、公众号为主,不能满足青年大学生多层次、多方面、个性化的需求。其次,覆盖比例较为有限,青年大学生偏好娱乐化、碎片化内容,对网络思政教育作品的关注度、点击率和点赞率普遍较低。最后,作品多由教师主导创作,青年大学生参与较少,导致内容“自说自话”,脱离青年大学生实际,难以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。

二、新时代高校完善网络思政教育工作的创新路径

(一)畅通运行机制,完善三育人格局

新时代高校应持续高度重视网络思政工

作,进一步畅通运行机制,完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。首先,构建并不断完善网络思政教育的长效机制,形成高效、全面、系统的育人方案,建立校级网络思政教育中心,负责协调校级网络思政育人工作,理顺内部关系,减少资源分散和重复建设等问题,通过提高教育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程度,形成高效顺畅的校级网络思政教育大平台,提高经费投入。其次,加强育人队伍建设,建立一支“专、兼职结合,以专职为主”的网络思政教育队伍。通过配备配强队伍,提高整体素质,以辅导员和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为主体,加强学习、培训和交流,激励他们积极参与网络思政教育工作,开发优质教育资源,维护教育平台,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。

(二)加强供给侧改革,提高育人作品质量

针对高质量育人作品匮乏的问题,新时代高校应该加强供给侧改革,提高网络思政教育作品的质量和数量。首先,加大经费投入,加强人才管理,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,为网络思政教育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。其次,更新数字教育理念,提升数字教育素养,加强数字知识和技能培训,使教育者能够熟练运用数字技术。最后,创新内容生产,紧扣党的创新理论和时政热点,结合青年大学生的专业特点和生

活实际,开发短视频、动漫等多元化产品,引导青年大学生积极参与互动,创造出具有亲和力、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高质量网络思政教育作品。

(三)提升传播力度,提高教育工作实效

为提升网络思政教育的传播力度和教育实效,新时代高校应该积极采取多种措施。首先,拓宽传播渠道,充分利用网站、微信、抖音等平台,满足青年大学生多层次、多方面、个性化的需求。其次,加强与青年大学生的互动和交流。通过组织问卷调查、线上讨论、意见反馈等活动,了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实际需求,及时调整教育策略和内容,扩大网络思政教育作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,提高作品的关注度、点击率和点赞率,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最后,鼓励青年大学生积极参与网络思政教育作品的创作和传播,发挥他们的主体性、积极性和创造性,推动网络思政教育真正入脑入心。

三、结语

新时代高校应该主动拥抱数字中国战略,积极解决机制、内容、传播等方面的问题,通过畅通运行机制、加强供给侧改革、提升传播力度等创新路径,不断完善网络思政教育工作,推动网络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,为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。

基金资助:202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“媒体融合传播视角下江苏高职院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研究”(项目编号:2022SJSZ1031)

优化“村改居”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

■中共惠民县委党校 王董业 中共惠民县委办公室 吕宜霖

性不高,未能形成治理合力。

二、新时代“村改居”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

体制机制整合,构建“分合有序”的治理架构。一是厘清权责边界,实行集体经济组织与社区治理主体分离运行,集体经济组织专注于集体资产保值增值,社区居委会负责公共服务、矛盾调解等社会治理事务,通过制度化设计避免职能交叉。二是建立城乡嵌套治理机制,整合乡村治理中的熟人网络、乡土规范与城市治理中的专业化、规范化优势,形成“正式制度+非正式制度”的互补格局。三是完善利益共享机制,通过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,让原村村民在享受城市化公共服务的同时,持续获得集体经济发展红利,实现“身份转变”与“利益保障”的同步推进。

党建引领赋能,筑牢“多元协同”的治理核心。一是构建纵向贯通的组织体系,建立“街道党工委、社区党委、网格党支部、楼栋党小组、党员中心户”的五级架构,将党组织触角延伸至社区治理末梢,确保治理指令高效传达与落实。二是创新横向联动机制,组织社区优秀社区党组织与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结成“红色合伙人”,通过干部“传帮带”、骨干“挂职学”等方

式,提升村改居社区党组织的治理能力。三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,吸纳原村老党员、老干部担任网格员、楼长,利用其威望高、熟悉民情的优势,化解新老居民矛盾,促进社区融合。四是建立“党建+议事”机制,推广“阳光17议”等做法,固定议事时间与流程,让居民成为社区事务的参与者、决策者与监督者。

服务精准供给,满足“多元分化”的治理需求。一是推动资源下沉,实行“小街道、大社区”工作机制,将街道干部、专业人才下沉至社区,充实基层治理力量;设立“家门口”服务站,整合养老食堂、法律援助等服务项目,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。二是推进服务数字化转型,建立社区居民数据库与智慧服务平台,实现缴费、投诉、政策咨询等服务“一网通办”,通过数据精准匹配供需,提升服务效率。三是强化分类服务供给,对原村村民重点加强思想观念引导与城市生活技能培训,帮助其适应城市化生活;对外来新居民侧重权益保障与社区融入服务,简化居住证明办理、子女入学等流程,消除身份隔阂。四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,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公益合作等方式,吸引社会组织、企业等参与社区养老、文化娱乐等服务供给,丰富

服务内容与形式。

文化认同构建,凝聚“社区共同体”的治理灵魂。一是挖掘乡土文化价值,保留社区传统民俗、节庆活动等文化符号,建立村史陈列馆、文化长廊等载体,增强原村民的文化归属感;同时将乡土文化元素融入社区公共空间设计,让新居民感受社区历史底蕴。二是搭建文化融合平台,通过开展邻里节、趣味运动会等群众性活动,促进新老居民互动交流,增进情感认同;组建社区志愿服务队、文艺社团等组织,吸纳不同群体居民参与,形成共同的社区记忆。三是培育社区共同价值观,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区治理理念,提炼通俗易懂的社区精神,通过宣传栏、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广泛传播,引导居民树立“社区是我家”的共建共享意识。四是建立矛盾化解机制,推广“电小红”工作法,组织干部深入一线与居民面对面沟通,通过“小马扎会议”等形式就地化解矛盾,避免文化冲突升级。

“村改居”社区治理优化是兼顾制度革新与人文关怀的系统工程,需破解体制、资源、融合等现实难题。以党建为引领,整合治理架构,精准供给服务,凝聚文化认同,让乡土底色与城市活力深度交融,方能打造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,为基层治理现代化与城乡协调发展注入持久动力。

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突破65%，“村改居”作为就地城镇化的核心载体,已形成区别于城乡二元结构的“三元”社区形态。这类社区兼具城市嵌入性与乡土延续性的双重特征,其治理面临体制衔接不畅、服务供给失衡、文化融合不足等结构性困境。探究新时代“村改居”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,对于提升基层治理水平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、推动乡村振兴具有深远意义。

一、新时代“村改居”社区治理存在短板

“村改居”社区治理面临多重结构性困境,其核心成因集中体现为四点:一是治理体制双轨化导致权责边界模糊,传统村级治理体制与现代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未能有效兼容,村委会与居委会职能交叉,集体经济组织与社区治理主体在资源分配、事务决策中存在利益博弈,形成“制度摩擦”;二是服务供给供需错位且资源配置失衡,公共服务过度依赖政府单一投入,医疗、养老、文化等优质资源城乡分布不均,同时原村村民与外来新居民的差异化需求未能得到精准对接,存在“供给不足”与“供给错配”双重问题;三是社区认同薄弱且社会融合不足,传统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被打破,新的社区共同体尚未形成,原村民的乡土情结与新居民的融入困境交织,导致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弱化;四是多元治理协同机制缺失,治理主体以政府主导为主,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不强,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,居民参与渠道不畅,积极